



## 壹、前言

入學方式的變革是臺灣教育改革中特別受到關注的一個部分。過去，完成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後，學生的升學管道主要是聯考。然而，聯考以智育為考核標準的設計，衍生許多教育問題，如補習教育的興盛、教學不正常化等，引起許多批評與檢討的聲浪（徐明珠，2009；楊朝祥，2002）。為了回歸教育本質，讓每個學生能適性發展，臺灣自2000年起實施「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方案」，企圖藉由篩選標準的多元化，使學校形成各有均衡發展的教育環境。

多元入學方案的制度設計，本意是希望不同才能的學生能選擇合適的管道升學，學校也能依自身特色，招收適才適所的學生（教育部，2012）。只是，實施至今，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仍存在著許多爭議。

從聯考與多元入學方案的實行方式來看，聯考的篩選方式是較為簡單的：符合考試資格的學生報名參與每年7月份舉辦的全國聯招考試，並以該成績進行升學志願選填及學校分發。因此，父母對於子女的教育投資著重於提升子女的學科成績，如讓子女參與學科補習、家教、學校課後輔導等，是常見的作法。

相較之下，多元入學方案的參與過程就顯得繁複許多，除了學生自身意願外，還包含校內篩選與各高中職的招生篩選，加上多元化的資格評選標準，學生面對的不再僅是學科成績上的較量，還必須透過各種活動表現來凸顯自己。於是，父母一方面必須想辦法投入更多金錢來培養子女能力以滿足升學考試的要求，同時，運用社會關係來獲得有利升學的相關訊息與資源也有了更多發揮影響力的空間。許多批評者就認為，部分入學管道所訂定的審核條件，如推薦甄試與申請入學常要求具備才藝或科研比賽成績、志工服務時數、小論文等成果證

明，不僅未能真正減輕升學競爭壓力，還為家庭資源較多的學生創造了競爭優勢，進而加深原有教育階層化的情況（李奉儒、詹家惠，2002；邱天助，2007；滕淑芬，2000；羅融，2002）。

家庭所提供的教育資源與教育成就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學界探索的核心議題。過去，探討影響學生教育成就的因素多半集中於討論家庭社會經濟背景的作用，後來，學者加入了財務資本、文化資本等中介變項來完善教育成就取得模型。Coleman則是最早將社會資本概念運用於家庭資源與教育成就之間關聯性討論中的學者。Coleman（1988）主張，家庭內親子關係對子女人力資本形成具有顯著的影響力；此外，他也認為，家庭內父母能提供給子女的資源畢竟是有限的，因此透過家庭外社會關係的建立，如父母與學校、社區鄰居之間建立緊密的互動，有助於取得更多教育資源，對提升子女教育成就有正面助益。

近年，在臺灣，入學方式的變革及其引發的公平性爭議，使得家庭社會資本與升學機會間的關係受到學者更多的注意。例如，陳建州與劉正（2004）在論多元入學的機會均等性時就提到，在多元入學篩選機制中，家庭社會資本對學校與學生自身的篩選具有一定影響力；陳怡靖與黃毅志（2011）的研究也發現，除了學科補習外，社會資本在多元入學管道的利用上確實有影響力。雖然他們的研究都討論了家庭社會資本與多元入學管道的對應關係，但是，這些研究未能進一步對家庭社會資本與升學分流機會之間的關係進行深究，對家庭社會資本所扮演之中介角色的理解也受到了限制。

因此，本文試圖從Coleman的家庭社會資本觀點出發，檢驗並估計家庭社會資本對學生升上公立高中的機會之影響效果，同時，本文也增加了過去研究很少採用的訪談資料。家庭社會資本概念強調家庭人際關係互動對教育成就取得的影響。然而，相關的量化指標並無法進